

泯天

梁晓声 著



退 火

梁晓声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泯灭/梁晓声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5039-3231-1

I. 泯… II. 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3520 号

泯灭

著 者 梁晓声
责任编辑 董 耘
责任校对 崔建文
封面设计 王 朝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96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39-3231-1/I·1516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出版说明

如果说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具有这样的品质——读者无论在多少年以后阅读它，都能从中感受到与当下世相密不可分的某些元素（无论是小说的思想性还是情节片断还是人物类型），那么梁晓声的《泯灭》绝对具有以上品质。

虽然我们并不太明白梁晓声为什么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作家身份一并赋予了一个人物，但我们钦佩他为文学的无忌的勇气。

我们相信，二十年、三十年以后，《泯灭》中仍会有若干种不过时的文学元素令人一翻即难释卷……

有过，亦或没有

(代序)

梁晓声

屈指算来，我写《泯灭》已是十五六年前的事了。

文化艺术出版社要再版它，我便重读了一遍。

掩卷沉思，我问自己，我当年将这部小说定名《泯灭》，究竟想表达些什么呢？

人有信仰，才有操守，进而才有所谓“泯”，才有所谓“灭”。

倘并无，“泯灭”的指出又从何谈起呢？

小说中的翟子卿可有什么信仰么？

我以为，是没有的。

晓声呢？也没有。

这两个共和国的同龄人，从不曾是共和国的任何方面的宠儿，甚至从不曾被关注过，他们只不过是草根阶层的两个儿子。他们的成长过程，倒确乎是新中国一味强化信仰的历史阶段。那一段历史可曰之为“红色政治”。对于宠儿，自然或会成为信仰。一切言行，对错唯以是否符合“红色政治”的准绳为原则。这样的人在从前的中国比比皆是，但子卿和晓声却都不是那样的人，“红色政治”只不过染红了他们的发肤而已。事实上，他们对于那“红色”，还每每地心生怀疑和不安。

而人生在世，总归还是要信点儿什么的。

他们也就是信善而已。那是他们的母亲们给他们的信仰，与宗教没有任

何关系。两位母亲只能给他们那么一点点有益的东西，是不知不觉中给的，于她们从未当成信仰来给。

那么，子卿也罢，晓声也罢，其实是两个那个时代的边缘人，是被漠视的大多数。他们在社会的边缘，不甘而又小心翼翼地活着。倘不小心翼翼，在当年他们是都有可能被“红色政治”一棍子打入另册，从此永无翻身之日的。

“改革开放”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一个从文了，一个经商了。

八十年代是中国人开始崇拜金钱巨大能量的“纪元年”。

本就没什么信仰可言的人，于是转而向金钱膜拜顶礼，自然而然地合乎规律。

子卿宁为金钱之奴；晓声面对金钱的诱惑苦苦挣扎。

他们都挺可怜。

富并不见得会使人注定富得“只剩下了金钱”。

没有信仰因而并无持久操守却又渴望暴富机会的人，一旦富了，才会富得“只剩下了金钱”……

子卿连母亲给他的那么一点点有益的东西也丢掉了……

晓声又能握持住多久呢？

金钱至上的时代，穷也罢，富也罢，其实人之心灵上都是可怜的。

我的这部小说也只不过揭示了那样一种可怜而已。

2007年4月1日

于北京

翟子卿是我中学同学，也是我小时候玩伴。一个人到了四十多岁的年纪，再懒得交际，也总会结识下一些人的。在这些人中，也总会选择几个作为朋友的。人到中年，又有了中年阶段的朋友，对小时候的玩伴，印象也就渐渐地黯淡了。偶尔想起，不过就是一部分破碎的回忆，除了反刍一点儿从前的灰色童年的温馨，实在也没什么别的亲韵可言。

但对子卿，我却很难忘怀，他仿佛永久地印在我记忆的底片上了。他仿佛是另一个我，替我在生活中追求另外的东西，因而使我简直无法不关心他存在的种种情况……

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当年是一块儿从山东从同一个小村里出走，“闯关东”来到东北的。当年他的父亲十五岁。我的父亲比他的父亲小一岁，叫他的父亲“俺哥”。如今的少年们之间，已很难有他们当年那么一种虽非手足亲似手足的关系了。人和人之间究竟能以什么样的关系相处，大抵也是由时代参与了决定的。

当年，我的父亲和子卿的父亲“闯关东”的野心自然是向东北的城市倾斜的。然而东北的每一座大小城市当年都排斥这两个身上一文不名，并且不谙世故的山东少年。最后他们不得不落脚在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渔村。它距离哈尔滨五十几里路。如果从江上划船逆流而上，距离会近不少。他们选择那个小渔村落脚，证明他们当年向往有朝一日混进城里的念头是非常顽固的，尽管后来他们分别娶了那个小渔村里的两个女人。

我六七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哈尔滨市里的孩子了。子卿和我同岁，他也是一个哈尔滨市里的孩子了。我们的父辈们的野心终于是实现了。我们的母亲们因此很崇拜他们。我们则更敬仰我们的母亲们。因为她们从不曾在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面前表现过丝毫的自卑，也因为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并不敢随意欺负她们两个来自农村的女人。据说当年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一向是很蔑视混进城里的乡下女人的。

严格地讲，我们两家其实并不能算在城市“里”，而是住在城市最边儿上的一条小街上。那条小街，好比城市这只巴掌上，靠近小拇指尖儿的一道最细的指纹。它的名字也起得低俗，叫“脏街”。也许并非它的名字，只不过被人们随口叫，久而久之，就成了它的名字。至于它原本的街名，倒无人知晓了。

当年我曾问过母亲：“妈，咱们这条街真叫脏街吗？”

母亲反问：“不真还假呀？”

我又问：“为啥叫脏街呢？”

母亲也反问：“你还觉得这条街不脏呀？”

那条街确实脏，很脏。街两旁的住房，如果那也算“住房”的话，像吸了一辈子烟叶的老太太嘴里七倒八歪熏黑了的牙。街一头是下水道，整条街上家家户户的泔水都往那儿倒，经常堵塞。除了冬季，下水道口几乎永远淤着臭水。人一走过，苍蝇便嗡地飞起一群。而冬季呢，周围冻着一层层有颜色的冰。一层层冰的一种种颜色，使人瞧见了恶心。颜色恐怕也只有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才会对人的胃起呕吐性的刺激。

街的另一头是公共厕所，是由碎砖、土坯、带树皮的木板和几片油毡纸组合成的。年月久了，砖色已变了，如同东北人做酱的酱块，而且是发了霉的。土坯呢，夏天淋冬天冻，早已粘合成一整堵土围墙了，而且倾斜着，似乎随时可能塌倒。带树皮的木板就更不用说它了，朽得刮阵风都往下掉些朽木渣子，手指轻轻一捅就一个窟窿。只有顶盖上的油毡纸，隔几年由街道卫生队负责换一次。街道卫生队是没钱改造那个厕所的，该做的也只能是隔几年替它的顶盖换一次油毡纸。他们一次也没舍得用过新的油毡纸，所用都是从建筑工地上收集到的废弃油毡纸。结果是，雨天或夏季炎热的正午，上厕所的大人们，总是在兜里揣一张旧报，蹲下后立刻双手将报抻开在自己头上。否则会有雨水珠儿或油毡的沥青滴落在衣服上头发上。曾有女人的头发因而被沥青粘住，用肥皂用碱水洗了好几次也洗不开的事发生过。最后她男

人用了半脸盆汽油才帮她洗开。

“脏街”上的人都得上那一个公共厕所。那条街上仅有那么一个公共厕所啊，这使它成了那条街上最公共的一个地方。经常可以看到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站在它的左侧或右侧聊天，是等着上厕所的人。上厕所的“高峰期”等在外边的往往还不止两个人，也有三个人五个人互相聊天一块儿等的时候。其中准有一个人两眼盯着厕所的入口，双脚不停颤动，脸上不时做出龇牙咧嘴的古怪表情，是憋得非常痛苦快憋不住了的那位。这时候厕所就仿佛变成了颇诡秘的一个地方，出来一个人，进去一个人。出来的满面歉意，进去的迫不及待。仿佛里面有一位什么神圣的人物，外面的人都是在期待着他的接见似的。当然过了“高峰期”，厕所外面没人排着的时候也有。只一个人耐心可嘉地等待着的时候也有。如果没人排在外面呢，刚上过厕所的人碰见了你，就会好心好意地告诉你——“还不快去上厕所？这会儿一个人也没有！”对方呢，则会下意识地掉头就往家里奔。揣了手纸后，冲出家门，忙不迭地往厕所溜儿小跑。那完全是一种条件反射，也许还有几分“千万别错过良好时机”的心理催促。而跑到了厕所跟前，他的泌尿系统或排泄系统每每提醒他完全是多此一举。倘厕所外只有一个人在等着，倘他或她又不甘寂寞，便会跟厕所里边那位聊。这种时候，里边一句，外边一句，一问一答的，拉家常唠社会，情形很有意思。反正这条街上的人互相都认识，除非两家有什么芥蒂，谁跟对方主动聊天，对方都是会表现出友善的配合热忱的。当然，因为里边的人腹泻或大便干燥，等在外边的人实在憋得不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了，于是相互口角乃至辱骂起来的不快事件也曾发生过……

我和子卿小的时候打过一架，就打过那么一架。后来在厕所这个公共的地方言归于好了，所以我对当年“脏街”上的公共厕所，至今保留着较深的、近乎怀旧的记忆。打架的原因极其简单——某天我俩走碰头，彼此撞了个满怀。按说以我们两家的关系，我俩是不该打起架来的。可是那一天我心里不知窝了股什么邪火，一直寻找机会发泄在某个人身上。子卿一向是让我三分的。当时我认为发泄在他身上正对。彼此错身而过之后，我突然冲口吼出一句：“你给我站住！”

他站住了，有些困惑地回头望我。

我恶声恶气地问：“你干吗故意撞我？”

他说：“我不是故意撞你的。”

我说：“你是故意的！”

他说：“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说：“反正你撞了我不行！”

分明地他也有些来气了，说：“不行能咋的？”

我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打得他鼻子流了血。他一拳打在我的眼眶上，打得我一只眼乱冒金星。

事后我母亲知道了这件事，狠狠训了我一通，还罚我面壁跪了半个多小时。

母亲指斥我：“知道错不？”

我说：“知道了。”

又问：“为什么错了？”

我说：“不该先动手打人。”

“连子卿都打，今后你还不打遍这条街哇？你爸知道了，非揍你不可！你知道子卿他爸的腿是怎么残的？那是因为一次在一块儿干活的时候，出了险情，为了救你爸……”

我懂事以后，见到的子卿他爸就是个瘸子。整天街上的人都叫他“收破烂儿的翟瘸子”。母亲说的事，此前我半点儿也不知道。

当天晚上，母亲扯着我，去子卿家向他赔不是。子卿的家比我的家还穷，只一间小屋子，床头那儿就是做饭的锅台。为了防止在做饭时床上的东西掉进锅里，在床头和锅台之间竖立着一块铁板。那铁板大概是子卿的爸收破烂收回来的。像这条街上所有人家的屋子一样，子卿家的屋子也是沉在地下两尺多的。这条街的地面原先高于人家的门槛。下雨的日子，雨水从街上往家家户户屋里流淌。人们无奈，只好用炉灰垫自己的宅基和门槛。经年累月的，就用自己家里掏出来的炉灰，渐渐地将自己家的房子埋了两尺多。从此，家家户户的门槛倒是高出地面了，但家家户户的窗台却矮了。坐在家朝外看，视线几乎跟地面平行，倘正有人从窗前经过，只能看到那个人的腿，连膝盖以上都看不到。

我母亲扯着我迈进子卿家的时候，我没料到他家的屋地比外边的地面低那么多，一脚踏空，险些连母亲也带倒，一块儿跌入屋里。幸亏子卿母亲手疾眼快，及时扶住了我母亲。子卿母亲当时正在做饭，更准确地说，是正往锅里贴饼子。子卿父亲正给子卿补鞋。他和我一样，没有第二双可换穿的鞋，也就只得老老实实坐在炕上，等着他父亲替他补好那唯一的一双鞋。

子卿母亲扶了我母亲一把，赶快又跨回锅台那儿，一边继续往锅里啪啪

地贴饼子，一边问：“谁呀？”

子卿母亲常年害眼病，视力很不好。

我母亲就回答说：“是我呀，你老妹子。”

那时还没来电。当年为了节约居民用电，要到晚上七点钟才开始供电。锅里散发的蒸气，弥漫在小小的屋里。子卿母亲每贴一个饼子，要先往锅里吹一大口气。吹散蒸气，看清锅里的情形，她才不至于将饼子贴到锅外，或将两个饼子贴在一起。在几乎完全没有光线的情况之下，子卿的父亲居然还能补鞋，使我当时不禁暗觉奇异。

子卿母亲往锅里贴完了饼子，盖上锅盖，推开家门散尽蒸气，接着在盆里洗手。她一边洗手，一边问我母亲：“老妹子，有事儿？”

我母亲说：“也算有事儿，也算没事儿，咋才做饭？”

子卿母亲看了我一眼，不回答我母亲的问话，却很是有几分不安地说：“你领着儿子来，我就知道为啥事了。子卿他爹已经把他揍过一顿啦！”

我和子卿都是随着我们的父亲们的山东人的叫法，称他们为“爹”，称母亲们为“娘”的。我们是整条街上仅有的两个不叫父母爸妈，而叫父母爹娘的孩子。别的孩子们因而叫我们“山东棒子”。我们的母亲们虽不是山东女人，但由于嫁给了两个正宗山东男人，也就早已接受并习惯爹娘的叫法了。

始终像个哑巴蹲在窗口补鞋的子卿父亲，这时才郑重地哼了一声，严厉地说：“打架还行？不揍还行？再打架，非揍扁了他不可！”

光说了话，没抬起头。

子卿呢，则胆怯地往炕角缩去。

我母亲说：“我可不是领儿子来告你儿子状的。我是领儿子来向你儿子赔罪的。听我儿子说，把子卿的鼻子打出血了呢！”望着子卿又问：“子卿，是把你鼻子打出血了吗？”

子卿低声嘟哝了一个字：“是……”

母亲就使劲儿拧我脸：“你把人家鼻子打出血了，又害人家挨了一顿揍，你还觉得委屈！你倒是有什么值得委屈的？快给子卿说句赔罪的话儿！”

我嘟哝：“子卿，我再也不跟你打架了。”

子卿母亲赶紧把我扯到她身后，护着我，对我母亲说：“拉倒吧拉倒吧，谁跟谁呀！俩孩子打架，一个不怨一个的事儿，赔的什么罪啊！亲哥俩还有打架的时候呢！”

子卿父亲也说：“拉倒吧。”

他仍专心致志地补鞋，仍没抬头。

随后我母亲就和子卿母亲聊起来。无非都说些她们那个松花江边儿上的小小渔村，景致多么的美好，人际多么的友善，夏季里大人孩子洗衣服洗澡是多么的方便。听她们那口气，仿佛迁到城里来住，摇身一变成为了城里人，其实是件很吃亏的事。

子卿父亲这时抬起头来了，表情很郑重地问母亲们：“后悔了？”

两位母亲互相看看，子卿母亲便不做声了，而我母亲却说：“有点儿！”

子卿父亲说：“那你让晓声替你给我老弟写封信，跟他商议商议，干脆咱们两家再迁回你们那个巴掌大的小渔村去算了！”

两个母亲又互相看了一眼。

我和子卿也不禁互相看了一眼。我们都不留恋“脏街”，尽管我们都是在“脏街”出生的。我们经常听母亲们在一起讲她们那个小小渔村里的人和事。既然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我们当然都希望父母们能下一个果断的决心，告别城市。更准确地说，是告别这条不值得人留恋的“脏街”，带领我们回到它那里去。哪怕是回到父亲们的山东老家去，也是我们非常之心甘情愿的啊！据我们想来，中国的任何一处地方，与“脏街”比起来，肯定的都不失为一个值得祖祖辈辈生活下去的好地方吧？

两位母亲的目光又缓缓地移在我和子卿身上。

子卿母亲说：“那，两个孩子怎么办？我们那儿又没学校，他们不上学了吗？”

我母亲叹了口气，也说：“是啊是啊，一想到两个孩子，这决定就不好下了呢！”

子卿父亲说：“那你们以后，就不要再当着孩子们的面，说些你们那个巴掌大的小渔村多么多么好的话！说些你们后悔不后悔的话！我和晓声他爹，少小的年纪就一块儿‘闯关东’，先是在城边上赖着混，后来终于和老婆孩子混进了城里，是那么容易的吗？这其中的苦辣酸咸，别人不清楚，你们心里还不清楚吗？”

我母亲抢白道：“咱们这儿也算城里哇？”

子卿父亲瞪起了眼睛：“怎么不算？咱们两家有户口本儿没有？有粮本儿没有？都有！都有就是城里人！连政府也承认的城里人！你们当我们拖拽着你们混是为啥？为我们自己？不是！是为他们！”

他用握在手里的锥子指指子卿，指指我，接着又说：“为他们将来有文化，也出息成两个文明人，跟我们当父亲的不一样！我腿残了，就不说我了。那就说俺那老弟！他现如今是工人阶级了不是？是啦！可没有文化的工人又是什么？旧社会叫臭苦力，插上条尾巴人家就把你当成头驴！拼上我们这一辈子，有苦往肚子里咽，也得叫子卿和晓声跟我们不一样！”

子卿父亲涨红了脸，说得格外激动。

两位母亲听着他的话，表情渐渐地肃然起来。

我和子卿也不禁地都装出肃然的样子。我望着子卿，觉得父辈们，是把什么无形的，但是却异常沉重的东西压在我们的身上了。子卿的眼睛告诉我，他当时心里也是这么觉得的。那一时刻，我们内心里都充满了对我们的父辈们、母亲们和我们自己的大的体恤。我们都明白了一点，无论我们多么地讨厌这一条城市边儿上的“脏街”，看来我们也得和它常相厮守了。

“外边有人等着没有？”

某天，子卿在公共厕所里大声地这么问。

我听出是他，不愿马上回答。

隔了片刻，子卿又大声问：“外边就没人等着吗？”

我忍住笑说：“有人等着，你快点儿！”

分明地子卿也听出了是我的声音，又隔了片刻，在里边搭讪着说：“是你小子呀！”

我说：“不错，是我。”

子卿说：“求个事儿行不行？”

我很干脆地说：“不行！”心想，你在里边拉屎，能求我什么好事儿？难道叫我帮你使劲儿不成？

子卿低声下气儿地说：“行吧！我忘带手纸了，分我一半手纸咋样？”

我一听，心里别提有多幸灾乐祸，说：“活该！”

他说：“‘俺弟’，别跟哥这样嘛！”

只有他父亲跟我父亲说话才可能这么说。

我心想——“俺弟”是你叫的吗？跟我来这一套？来这一套也不给你面子。

我仍因前几天我们打那一架多少有点儿记他仇。

他说：“你就这么不重情分啊？你忘了我对你好的时候啦？”

我说：“忘啦！”

他说：“那，我出不去，你可也别想进来。”

我说：“那你就一辈子蹲在厕所里吧，我回家去了！”

我说完，绕着厕所跑了一圈。

子卿在厕所里高叫：“哎，哎，‘俺弟’！‘俺弟’！你别走嘛！”

我听了，心里又多了几分幸灾乐祸。

但是，比较而言，在忍耐力方面难以持久的毕竟不是子卿，是我。

子卿猜测到了我其实并没离开，反而在厕所里大声唱起歌来……

他也唱出了几分幸灾乐祸。

我开始觉得痛苦了。

我又憋了一会儿，实在憋不住了，终于不得不问：“你到底出来不出来哇？”

子卿说：“暂时又不想出去了！”

我说：“‘俺哥’，快点儿出来吧，我都要尿裤裆里了！”

他说：“活该！你尿裤裆里我才高兴！”

接下来自然轮到我央求他了。而结果是——我走入厕所，将我带的手纸一分为二，将面积明显大些的那一部分恭恭敬敬地奉献给他。

我从厕所出来时，见他站在厕所外，没走。

他说：“出来了！”

我说：“我又不想屙完了还蹲在里边唱歌！”

他得意地一笑：“我在等你。”

我说：“我可没求你等我。”

他说：“那就算我自己乐意等。‘俺弟’，咱俩以后别怄气了，啊？”

他说完，将胳膊亲昵地搭在我肩上。

从此我们再也没互相闹过别扭。我们就像当年“脏街”上互相最亲爱的一对亲兄弟。

在我们全班，乃至我们全校，子卿始终是学习最好的几个同学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小学三年级的期中考试，他又得了“双百”，全班仅他一个学生得“双百”。公布成绩时，老师照例对他大加夸奖。同时叫起了三个不及格的学生，教训得他们一个个低垂下了头。三个不及格的学生中，有一个还是留级生。

放学后，我和子卿刚走到一条胡同口，被那三个不及格的同学拦住了。分明地他们是预谋好了，专在那儿堵截我们的。

为首的留级生气势汹汹地对子卿说：“翟子卿，我们早就警告过你，不许你再考‘双百’，你为什么还故意考‘双百’？”

子卿说：“那我也不能故意往不及格了考吧？”

对方一听更来气了，当胸捣了他一拳：“你让我们三个当众害羞，今天我们三个也非得羞羞你不可！”

我说：“你们干吗欺负人？”

他一推，将我推倒在地，恐吓道：“你又没考‘双百’，没你什么事儿，别找不自在！”

我爬起来，对子卿说：“子卿，你别怕他们！要打就打，我帮你！”

子卿却说：“那，你们想怎么羞我？”

他们说——得子卿从他们胯下钻过去才肯放过我们。

子卿听了，默默将书包从身上取下，递给我。

他们以为子卿真想和他们打架，都防范地摆好了姿势。

我知道子卿是不敢和他们打架的。倒不见得是因为他多么的怕他们，其实他是很能打架的，他内心里根本不至于怕他们。他是怕他的父亲，他实在是太怕他的父亲了。他父亲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位上帝似的。他因和我打那一架挨了他父亲的揍以后，再受到挑衅甚至受人欺负，就学会了一个“忍”字。

子卿又默默脱下打了好几处补丁的裤子递给我。

这使他们非常困惑，面面相觑，搞不明白子卿究竟是要干什么。

子卿却说：“我钻……”

子卿说完，就双膝跪下去了。

而他们这时都蛮横地笑了。他们一个个叉开两腿，一个站在另一个的身后。

当子卿从第一个人的胯下钻过之后，我发现第二个人将手伸进裤裆里去了，我立刻明白了他想干什么！

我大叫起来：“子卿，别钻了，他要往你身上撒尿！”

可是尿已经撒到子卿身上了。

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之下，欺辱别人的心理快感表现在缺乏良好品德教育的孩子们身上，也是和大人的罪过行为一样邪恶的。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将我自己的书包和子卿的书包、裤子往地上一抛，像一条扯断了链子的狼狗似的朝他们扑过去……

子卿见我已然和他们扭打作一团了，才开始和我一起勇猛无比地讨回他失去的公道。

三个同学自感无理，也意识到他们自己欺人太甚了，先自心虚，哪里还敢真和我们打下去？都吃了些亏，哀哀疼叫着，互相照应着摆脱了我们的无畏还击，仓皇而逃。

子卿的裤子却在扭打中被踩破了。

子卿不敢直接回家，跟我到了我家里。

母亲听我讲述了一遍经过，抚摸着子卿的头说：“孩子，你也忒老实了！他们叫你从他们裤裆下钻过去，你就真钻啊？还脱了自己的裤子钻！”

子卿噙着泪说：“娘昨天夜里刚给我补好的裤子。娘说布已经‘绦’了，再也挂不住补丁了。娘嘱咐我要小心在意地穿，说穿两个月后才能给我做条新的。”

子卿说完，就哇地哭出了声。

我这才明白，子卿他不和他们打架，子卿他脱下自己的裤子钻他们的胯，不仅因为他怕他的父亲，还因为他那条补了好几处补丁的裤子在两个月内是万万破不得的。

子卿哭得我也难过起来，哭得母亲也落下了泪。母亲爬上炕，翻箱倒柜，找出一条父亲的肥大的旧劳动布裤子，剪去一尺多裤腿儿，粗针大线地给子卿改成了一条他勉强可以穿的裤子。子卿穿上了它模样显得滑稽可笑，如同一只从母袋鼠腹袋之中探出上半身惊诧地张望世界的小袋鼠。

我和子卿上小学四年级那一年，子卿的父亲去世了。他父亲是由于患胃癌去世的。当年“癌”还是一个不太常听人提到的字。对于穷困人家来说，更是“不治之症”，甚至是糊涂之症。子卿父亲忍受了很大的痛苦，有时疼得在炕上滚来滚去，还大口大口地喷吐鲜血。那时子卿母亲便惊恐地替子卿父亲轻拍后心，或者抚他的胸口。那些做法当然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丝毫减轻不了子卿父亲的痛苦。而小小的子卿，则双手端着脸盆，浑身抖抖瑟瑟地仁立在炕沿前，接着父亲口中喷吐出的鲜血。那对他是一件必须那样做而又极其害怕的事。他可怜自己的父亲，也可怜自己的母亲。父亲口中喷吐出的鲜血往往溅在他身上、手上和脸上。有一天，我到他家去正好碰上了那

样的情形。目睹子卿双手哆哆嗦嗦端着的半盆鲜血，我几乎晕倒在他家里。我虽然并没晕倒在他家里，却亲眼见子卿因心里过分紧张而晕倒了，半盆鲜血泼在他身上。

非但子卿，连子卿母亲和我母亲当年也不知他父亲得的究竟是什么病。他母亲和我母亲在那条街上逢人便问——什么是癌？怎么得了癌，医生便说没法治了！只能等死了！有没有什么偏方可治？当年那条街上没有一个人能向他母亲或我母亲讲清楚什么是“癌”，更没有一个人向两位母亲介绍过某种治癌的偏方。穷困的老百姓对穷困的老百姓的同情，往往也只能是相与说几句劝慰的话，陪着唉声叹气，陪着掉几滴眼泪而已。子卿父亲死前已瘦得皮包骨。临死前他还以为，他是被肚子里的蛔虫害的。

是我母亲帮他母亲给他父亲穿上寿衣的。

是我母亲帮他母亲将他父亲发送了的。

冬天，我父亲从大西北建筑工地回来探家时，亲自去子卿父亲坟前磕过头。

当时我父亲眼中流泪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

父亲对着坟头说：“俺哥，你就放心吧！嫂子和孩子往后的日子有你弟妹照应着呢。我看子卿这孩子很懂事，学习又好，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一定会对得起你的养育之恩……”

子卿父亲活着的时候，在我们那条街上，他家的生活已是最穷的了。他父亲一死，他家的日子更难过了。最初靠街道的救济勉强度日，后来街道不救济了，不得不靠变卖家当了。当年的穷老百姓人家，哪里谈得上有什么“家当”可卖！所卖其实都是过穷日子离不了的东西，卖了也不值几个钱，不卖则连买粮的钱都没有。

不久我母亲当上了街道居民组组长。那时街道上成立了一个把石棉加工成石棉线的小工厂。为了照顾生活困难的居民，允许一部分街道妇女将石棉领回家去纺。这一部分不多，而希望挣那点儿钱的人却很多。我母亲利用居民组组长的小小权力，替子卿母亲争取到了优先权。

我再去子卿家，便常见他母亲缩居屋角，机械弓腰，倦纺不止。纺声嗡嗡，飞絮满屋。而子卿盘膝于炕，伏在一张小矮桌上，专心致志地学习，仿佛一点儿也不觉得受影响。他母亲脸上扎着一块浸湿了的旧手绢，他脸上也扎着一块，母子二人都只露出双眼。生人到他家里去，准会吓一大跳，准会怀疑自己迈进了一户怪异的人家。手绢扎在脸上，掩住口鼻，是为了挡住石